

论李商隐与杜牧的边疆民族题材诗文〔*〕

王树森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安徽 合肥 230051)

〔摘要〕李商隐与杜牧十分关注晚唐边事。两位诗人有关边疆民族问题的诗文,全景式地反映了晚唐前期(从唐穆宗至唐宣宗)的边疆形势。针对久未纾解的边疆困局,两位诗人依据各自的经历与理解,均试图找出其中的深层政治军事与社会历史根源,杜牧侧重于检讨唐王朝应对边祸的具体政策失误与体制机制弊端,李商隐则专注于反思唐最高政治伦理的腐败。李商隐与杜牧对边疆民族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深切思考,共同反映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忧天下的使命担当,代表着一种昂扬激越的民族精神状态在末代的壮丽回归。与此同时,通过考察小李杜对关涉晚唐边政的关键人物与事件的品评判断,会发现在面对历史是否能秉持客观公正态度这一重大考验上,两位诗人难免存在轩輊高下。

〔关键词〕边疆;现状;反思;精神;品格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10.012

唐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纷繁复杂的唐代民族关系,特别是唐与突厥、吐蕃、回鹘、南诏等民族政权长时间高烈度的接触碰撞、战和往来,既深度影响着唐王朝的国运,也给文坛提供了一类重大而恒久的话题。自唐初起,唐太宗、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岑参、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及陆贽、沈亚之等几代诗人或政治家,都曾留下关涉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篇章。李商隐与杜牧所处之晚唐,不仅唐王朝自身走向衰落,几大兄弟民族政权间的恩怨纠葛也已临近结局。两位大诗人,既由于共同的牵心家国的赤子丹心,也得益于均曾近距离

接触了解当时边疆实际的机缘,在各自诗文中都对晚唐乃至有唐三百年边疆民族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关注与思考。专题研究小李杜的这部分作品,不仅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深刻认识唐代边事,同时对准确把握小李杜的思想与创作,亦有显见之益处。

一、对晚唐前期边疆形势的深刻揭示

李商隐(812—858)与杜牧(803—852)的主要生活年代,是在宪、穆、敬、文、武、宣六朝。若以具体作品系年为标准,二人的活动时间,则上起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下迄唐宣宗大中十二

作者简介:王树森,文学博士,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代地方行政与文学关系研究”(批准号:15CZW021)的阶段性成果。

年(858),总计三十五年左右。^[1]这三十五年,就唐王朝而言,边疆民族形势的发展,历经穆、敬二朝(821—826)的因循放任,文、武二朝(827—846)的力图振作并继有创获,以及宣宗朝(847—859)表面上山河完聚但边疆仍未实质安宁的三个阶段。李商隐与杜牧的边疆民族题材诗文,其价值首先在于真实而有情韵地记录下晚唐前期这段边疆上的起落变迁历史。

李商隐现存最早一篇关涉晚唐边事的诗章,是其讥讽唐敬宗耽于荒嬉,不以国务为念的少作——《富平少侯》,该诗首联云: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

清人冯浩笺云:“统观李唐全代,中叶以后,河朔既不可复,诸藩镇屡有擅命,吐蕃、回鹘、党项先后频入寇,盖内外皆不宁矣。而敬宗童昏失德,朝野危疑,故连章讽刺,以志隐忧。此章首七字最宜看重。”^[2]足见当时唐王朝的边疆依然多事。多年以后,杜牧在《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吏部尚书崔公行状》中,借传主崔郾之口,追述穆宗朝内忧外患交织并存的形势:

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游声色为事。

公(按,指崔郾)晨朝正殿,挥同列进而言曰:

“……自山以东,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垒,距宗庙十舍,百姓憔悴,蓄积无有。愿陛下稍亲政事,天下幸甚。”^[3]

“自山以东,百城千里”指河北藩镇割据,“西望戎垒,距宗庙十舍”说的则是中唐以后吐蕃等族军事力量长期盘踞原属唐土的河湟地区,完全可与义山之诗互证。而且合而观之,可见继中兴之主唐宪宗后在位的穆、敬二帝,无论是对待内乱,还是外患,均以消极态度应付。内乱暂置不论,^[4]边疆问题,尤其是河湟千里土地沦入吐蕃之手时近百年,极大关乎王朝利益与民族情感,社会各界牵心甚重,无可回避。何以穆宗、敬宗绝少谋划?二帝童蒙昏聩,不忧国事之外,亦因为早在穆宗即位之初,唐与吐蕃再次会盟,同时

又命太和公主出降回鹘。^[5]这两个看似成功的外交实践,足以让二帝麻痹松懈。问题在于,由来已久的边疆动荡不可能因这两次会盟与和亲而得到根本纾解。以吐蕃为例,唐与吐蕃长庆元年(821)会盟,但据《资治通鉴》所载,仅长庆二年六月,吐蕃即两次进寇灵武与盐州。^[6]李商隐后来进入泾原幕府,从其所作《为濮阳公上陈相公状》中“蕞尔寇戎,不循盟誓。稽留重使,侮易大朝”等句所透露的信息,也可见吐蕃与唐虽订盟约,但直至文宗开成年间,依然不断在唐边疆生事,甚至还拘留唐使。^[7]至于冯浩笺评中所提及之党项与回鹘的威胁,杜牧后来于文中更有详细记录:

伏以党项……,比以回鹘未殄,吐蕃正强,且须羁縻,未可重振,于是边疆日骇,种类岁繁,每至劲弓折胶,重马免乳,以魁健之质,张忿鸷之凶,劫馈穀以焚舟,杀辎车而闭道。众虺盘结,群犬叫牙,依据深山,出没险径。近在宇下,游于毂中。艰难以来,不能铲削。

——《贺平党项表》

伏以回鹘种落,……今者国破众叛,逃来漠南。为羁旅之魂,食草莱之实。……今者度虜之计,不出二者。时去时来,徊翔不决,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约,同其气势,同为侵扰,此其一也。心胆破坏,马畜残少,且于美水荐草,暖日广川,牧马养习,以俟强大,此其二也。

——《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

这些对边疆形势的描述,容或有渲染的成分,但基本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杜牧指出各边疆民族不仅能独立攻唐,而且彼此之间还能形成联合而犯的态势,不仅一再被历史所证明,^[8]也足以说明当时唐朝社会对边疆严峻形势之深切忧虑。

穆宗、敬宗在边事上的无所作为,在唐文宗即位以后,开始出现改观。唐文宗有志于维护唐的边疆权益,他一度支持李德裕接受维州归顺的建议^[9];为了收复河湟故地,他甚至同意委任郑注担任凤翔节度使作前期准备^[10]。尽管受制于党争的倾轧,加之所用非人,这些计划大多夭折,

但在最高君主的政策影响下,边疆上也一改昔日暮气沉沉的景象。这种改变,李商隐因为于文宗后期进入地处唐蕃对峙前线的泾原幕府,敏锐地捕捉到了。

李商隐早年所接触的前辈如崔戎、令狐楚、周墀等人均习察边事,^[11]但他第一次对边疆的近距离感知,却是在王茂元的泾原幕。李商隐入幕期间,代王茂元起草过多封章奏,多涉文宗朝西北边情。其中,《为濮阳公陈情表》中云:

俄以朝那阙守,昆壤须人。一去阙庭,五罹寒燠。处京畿五百里之内,控蕃寇数十州之多。提鼓烧烽,增埤浚湫。虽国家远追上策,不事交争;然蛇豕难防,犬羊易纵,苟罢严撤警,则负约渝盟。臣自受命以来,为日斯久,未尝一日不修战格,未尝一日不数军储。使士有斗心,人无虚额,使之侦候,咸亦闻知。尚未能率厉骁雄,揣摩锋镝,远收麻垒,直取艾亭,成大朝经武之威,毕微臣报主之分。

《表》文作于王茂元离任泾原之际,本段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有三:第一,以吐蕃为代表的民族势力,当时仍构成对唐西北边疆的现实威胁,因此不能掉以轻心;第二,王茂元任职期间,积极备战,严阵以待,使一度懈怠的边军士气得到了扭转和提振;第三,直至离任,中唐以后被吐蕃占据的河湟千里土地民众仍未收复,未竟全功,殊为遗憾。虽然此表作为王茂元个人述职报告呈奏,但是完全可以看成是对文宗朝应对边疆危机局面有所改观却仍待深化的阶段性总结。

让唐文宗、王茂元等依旧抱憾的边事,很快在唐武宗、李德裕的操持下取得重大突破。会昌年间,唐利用吐蕃、回鹘两大宿敌均已分崩离析的有利时机,平定北疆,谋复河湟。^[12]这一轮军事行动,李商隐与杜牧虽未参与其中,但是其诗文中却有对边疆胜利的赞誉,杜牧的《皇风》:

仁圣天子神且武,内兴文教外披攘。以德化人汉文帝,侧身修道周宣王。远蹊巢穴尽室塞,礼乐刑政皆弛张。何当提笔侍巡狩,前驱白旆吊河湟。

李商隐作于会昌四年的《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亦有这样一段文字:

顷单于故境,獯鬻遗疆,屢缘丧荒,亟致携二。凤沙自缚其主,冒顿忍射其亲。遂去北边,欲事南牧。既赫斯而貽怒,乃密勿而陈谋。管氏将来,屢发新柴之井;留侯每入,便闻借箸之筹。群帅受成,中枢独运。前军露板,方事于羽驰;清禁寿觞,旋闻于月捷。仍其贵种,慕我华风。或辨姓写诚,推诸右校;或释兵伏义,列在周庐。……其余麋惊鸟散,风去雨还。亘绝幕以销魂,委穷沙而丧胆。胡琴公主,已出于襜褕;毳幕天骄,行遗其种落。向若非薛公料敌,先陈三策;充国为学,尽通四夷,则何以雪高庙称臣之耻,全肃宗复京之好?

杜诗颂圣(唐武宗),李文美相(李德裕),但对会昌用兵边疆之战果的细致描写与肯定性评价则是客观的。尤其是李文,从用兵的有利条件(回鹘衰落内乱),写到李德裕的周密的部署(密勿陈谋)与统一指挥(中枢独运),再写到军事胜利的现实成果(回鹘奔散,公主回朝^[13]),讲得十分到位。

武宗君相用兵边疆,直到其后的唐宣宗在位时,战果仍在继续扩大,大中三年(849)以后相继迎来被吐蕃长期占据的三州七关的回归以及敦煌地方政权向唐贡献图籍。唐宣宗在《收复河湟德音》等文中,还公布了重新建设经营西北的宏伟计划。^[14]收复河湟以及其后边疆形势的一系列积极变化,不仅引起晚唐文人的“联为表贺”(李商隐《樊南乙集序》),杜牧由于在大中朝回到朝廷担任中书舍人职,更亲眼见证了唐最高统治集团接受安顿故地遗民的各项工作部署。其所代拟的《李诚元除朔州刺史制》《薛逵除秦州刺史制》《敦煌郡僧正慧苑除临坛大德制》等多封任命文告,即显示出流离百年的河湟千里之地,至少在形式上,此时重新回归唐王朝的治下。

尽管如此,边疆仍未真正获安,李商隐与杜牧在诗文中,或自觉或非自觉地反映了大中朝后期边疆上所潜伏着的新的更大的危机。

李商隐自大中元年以后,先入桂管郑亚幕

(郑亚是会昌朝李德裕倚重的重要将领^[15]),继而又于大中四年入东川柳仲郢幕,两次佐幕前后超过七年。和早年近距离感知西北边情所不同的是,这段时间的李商隐接触的是西南的边防形势。西南一带自古多民族杂居聚居,从唐玄宗统治中期开始,唐在西南就长期面对两大强邻——吐蕃与南诏。进入晚唐,尽管传统意义上的吐蕃政治军事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但吐蕃长期盘踞川滇,纵然是原先的政权瓦解,遗留于此的藏族民众仍然需要持续与当地其他民族接触磨合(后来的历史证明,直至晚清民国,西南等省藏区,民族矛盾依然多发频发)。而南诏则自文宗大和三年(829)攻蜀获胜后,不断坐大,大中、咸通以降,给唐带来的边防与财政压力愈加沉重,陈寅恪后来甚至将南诏之祸类比为“明季之‘辽饷’与流寇”(《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编)。李商隐在西南,多次于诗文中提醒需要注意吐蕃余部和南诏势力的共同威胁,如“南诏知非敌,西山亦屡骄”(《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南诏应闻命,西山莫敢惊”(《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上杜七兄仆射相公》)、“况(蜀)天有井络,地称坤维。控三巴百濮之雄,带南诏西山之险”(《为柳珪上京兆公启》)。唐末西南边境新的并不轻松的情状,于此间已有明确揭示。

大中三年三州七关的回归,不啻为注射在晚唐衰败肌体上的一剂强心针,但是李商隐作于大中三年以后的诗作,既言“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即日》),又云“况今西与北,羌戎正狂悖”(《骄儿诗》)，“犹”“正”二字,都传递出北疆警情不断的现实。在佐幕桂管期间,李商隐代郑亚起草了多封评论北疆防务的信札,直指西北的党项与东北的奚族是唐的重要边患,如“伏以北边诸虏,最强者奚”(《为荥阳公贺幽州张相公状》);“近者党项侵扰西道,倔强北边”(《为荥阳公贺太尉王司徒启》)。至于杜牧,不仅有《贺平党项表》一文纪述大中朝针对党项的军事行动,他还有一首《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辄书长句》^[16]:

将军独乘铁骢马,榆溪战中金仆姑。死绥却是古未有,骁将自惊今日无。青史文章争点笔,朱门歌舞笑捐躯。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

虽以旷达之笔书写流血牺牲,但唐与党项战斗之惨烈,却不难想见。在那个已经被认为边疆无事的岁月里,烽火依然处处燃烧,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所不同的只是换了对手,以前是吐蕃、回鹘以及更前面的突厥,此刻则变成了党项、奚(契丹)与南诏,当中原由唐经五代入宋,边疆上的民族政权,也更名为西夏、辽与大理,它们将在新的时代里上演一幕全新却又似曾相识的兄弟民族从接触碰撞走向交流融合的历史正剧。

二、对中晚唐边疆困局成因的深入反思

大中三年早春,甫自桂林返京的李商隐,创作了《骄儿诗》一首,诗中针对依旧胶着纠缠的边疆现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诛赦两未成,将养如痼疾。

这两句诗将晚唐边患比作久病之人体内的“痼疾”:既无力像进行手术切割那样予以彻底克服,而曲意逢迎又只能听任外患如肿瘤扩散般步步吞噬健康肌体。义山的感觉是准确的,其实不独当时唐王朝应对边患愈来愈进退无据,回顾有唐一代边疆经略的历史,像如此“诛赦两未成”的棘手困境,从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中唐以后则更是呈现出愈陷愈深之势。对此,有识之士不能不有所思考。至迟从杜甫起,文人们便在诗文中竭力探求王朝边疆经略的是非得失,^[17]李商隐与杜牧,既有眼界,又处末世,使他们有条件对唐代边事成败及其因由作出有指向有深度的反思。

李商隐与杜牧对唐代边事的反思,首先致力于就实际边疆应对方略与体制机制弊端进行检讨,这又以杜牧最具有代表性。杜牧在晚唐文人中,以评论“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而著称,在《上知己文章启》中,他曾自述其《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送薛处士序》《阿房

宫赋》等多篇名文的创作缘起,几乎均为针对时政的思考评论,其中多涉及边事。杜牧关于中唐以降边疆困局成因的探求,既包括对具体战役组织策略的建议,而时近百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上知己文章启》)的表现与危害,更是其所着力考索处。

晚唐时期,中原王朝对外用兵,以会昌朝伐回鹘、大中朝御党项的声势较大,杜牧在这两次用兵过程中,均曾上书献策。约作于会昌四年之后的《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一文,杜牧先说“今者征中国之兵与之(按,指回鹘)首尾,久戍则有师老费财之忧,深入则有大寒瘕坠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奸杰之心。今者不取,恐贻后患”,主张对回鹘要采取速胜的方略。又否定当时朝廷内部一种联合黠戛斯会讨回鹘的计谋,认为如行此举,即便讨灭回鹘,黠戛斯又会成为新的“勍敌”,造成“示之以弱,必为所轻”的危害(后来北宋选择同女真联合灭辽而南迁,南宋选择同蒙古联合灭金而覆败,所吞下的就是这样的苦果)。大中三年,针对当时平党项战役的失利,杜牧在《上周相公书》中,又对致败之由作了细致分析,指出失败缘于操持边务者不刻苦学习军事:“天时、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计量短长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灭朴樾之虏,此乃不学之过也。”显示出杜牧对于如何出兵如何制定军事方略,确有自己的见解。

这些见解,是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得出的。杜牧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对行姑息“仁恕”之政的质疑。杜牧云:“国家自有天下已来,二百三十余年,专用仁恕,每后刑罚。是以内难外难,作者相继,土地甲兵,权柄号令,尽非我有”(《黄州刺史谢上表》),旗帜鲜明地道出了行“仁恕”之政的危害。杜牧尤其对大历、贞元两朝的姑息取辱大加讨伐,《守论》一文系统论析大历、贞元两朝的姑息之政,并发出“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的警告。《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作于河湟回归群臣上宣宗尊号之际,中云:“大历、贞

元之际,河北、河南之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国皆叛乱之臣。”虽就内部的藩祸发论,但内乱应对是否得当,必然会直接影响到抵御外侮的成效。杜牧曾云:“天下无河北则不可。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卒然夷狄惊四边,麾封疆,出表里,吾何以御之?”(《战论》)在杜牧看来,单纯推行仁恕姑息之政,不仅无法稳定内部,同样不能凝聚力量解决边疆民族问题。

二是对边将的擅功邀赏的批评。古代兄弟民族间所发生的碰撞,始作俑者未必都是边疆民族部众的进犯。那些被中原王朝委派至前线任职的边将们因各种利欲诱惑,特别是受大民族主义观念驱使而骚动边境,欺侮边民,同样能诱发边疆民族兴兵作“乱”。杜牧对边将贪鄙邀功、祸乱边陲深恶痛绝,在多封文牍章奏中对此予以指斥。如其在《李诚元除朔州刺史制》文中云:“开元时,吐蕃上书,悖慢无礼,皆边将造伪,交斗华夷,冀立功勋,以求为赏”,指出开元时唐蕃交恶有唐方边将有意虚报边情以邀功取宠的因素。文章继而又云:“自长庆以降,怠于制置,西北守帅,多非其人,侵略种落,厚自封殖。”这些词句也完全可与杜甫之诗以至中唐元稹、白居易之新乐府《缚戎人》《西凉伎》《新丰折臂翁》等章所标举之“达穷民之情”“刺封疆之臣”“戒边功”等主旨对读互证,说明边将生事确为导致边境动荡的重要祸端,且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有效纠正。河湟收复,杜牧还上书提醒皇帝注意边将所易犯的“或但恣于贪婪,或不事其兵食”(《谢赐御札提举边将表》)的顽疾,并恳请皇帝切下严旨予以防范告诫。

三是全面总结边疆应对体制机制的落后因素。唐王朝应对外患长期收效甚微,原因是复杂的,就唐内部而言,除了那些具体的策略错误,体制机制层面的整体僵化落后也应被深入追究。杜牧约在大和七年前后撰写了《战论》一文,文章前序开宗明义:“兵非脆也,谷非殫也,而战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点出失败的根源在于“不循其道”,而不是兵甲的钝铍或供给的不力。杜牧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唐有“五败”,即“不蒐

狩之过者，其败一也”；“不责实科食之过，其败二也”；“赏厚之过，其败三也”；“轻罚之过，其败四也”；“不专任责成之过，其败五也”。并指出：以宪宗这样急于太平且英武任事的君主，专力内征外讨，都需耗费四年光阴，尚且只能小有进展，根本原因就在于“五败”的掣肘。其实早在唐德宗贞元八年（792），陆贽便指出唐有“六者之失”，即“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他认为“此六者，疆场之蠹贼，军旅之膏肓。蠹贼不除，而滋之以粪溉；膏肓不疗，而苟啖之以滑甘。适足以养其害，速其灾”，^[18]呼吁最高君主立行立改。陆贽的“六失”论与杜牧的“五败”论，虽然具体分类有差，但核心观点前后呼应，说明有识之士对唐边防积弊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与杜牧侧重从政治军事策略角度反思唐王朝百年应对边疆危机得失有所差异的是，李商隐更专注于道德伦理层面的致乱根由。换言之，杜牧关心的是一项策略一种体制运行起来的利弊短长，而李商隐则把“人”的善恶贪廉作为反思的对象。用他自己的诗句表述，就是：“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

李商隐早在其少作《富平少侯》中便将国事荒怠归咎于最高君主的当忧而不忧。成年之后，随着社会阅历与人生体验的增加，他越来越注意考察最高政治伦理的善恶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关系。开成二年十二月（838年初），李商隐护送令狐楚灵柩北返，当他越过大散岭，来到当时凤翔府所辖之京西地区，满目荒芜之景。抚今而追昔，系统回顾唐开国以来政治兴衰的历史，写下了集中第一政治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长诗的主旨即“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值得注意的是，长诗敏锐地将唐政治由盛转衰的关节点定在“开元中”，而其显著表现就是因李林甫“多录边将勋”而造成朝野推重崇尚边功的价值选择。自此，“猛毅辈”代替了“贤牧伯”，惠养尽失，征求渐频，安史之乱后又有吐蕃等族进犯，就更招致“南资竭吴越，西费失河源”的财政危机

与疆土沦丧。面对政治困难，假如当局者痛定思痛，卧薪尝胆，那么未尝不会有重新振作的可能。但是问题在于，唐最高统治者从来不愿意在根本政治伦理层面予以彻底检讨。安史叛军蜂拥而至，当朝诸公是什么表现呢？诗云：“廷臣例箝怯，诸将如羸奔。”有如此文臣武将担纲，才会出现“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的自毁长城与“送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的乘国之危。百年河湟危机，给全社会造成极大心理阴影，入蕃使节吕温亲履故地，所面对的是“遗老相依”而披发东哭（《题河州赤岸桥》）的一片赤诚守望，^[19]但李商隐所睹闻的则是一幅“列圣蒙此耻，含怀不能宣。谋臣拱手立，相戒无敢先”的画面，君主甘心忍耻，谋臣无所建树，其丑态有如木偶。有这样的君臣在执掌政局，中晚唐的边疆民族危机又如何有破解之可能？所以，解决“人”的问题，解决最高政治道德伦理的积弊，才能为具体战略战术的制定实施创造出最基本的发挥空间。李商隐抓住这一根本予以深刻剖析，不仅在当时，即便是今天，对于人们更为准确地认识唐王朝边患的产生及应对困局，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之后，李商隐仍然持续关注外患问题，《思贤顿》《咏史》《汉南书事》等诗作，都承载了他的深入思考。《思贤顿》次联：“舞成青海马，斗杀汝南鸡”，清人何焯笺云：“借舞马、斗鸡二实事暗寓重兵在边、宿卫单薄之意。”（《义门读书记》）其实青海马与汝南鸡都是玩物，是玄宗晚年游嬉无度的见证。《隋书·吐谷浑传》记云：“吐谷浑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骠驹，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骠马。”如果将该句与《咏史》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汉南书事》中“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等诗句参读，就更能明了诗人讽刺边祸实从人君贪奢而起的论证逻辑：首先唐玄宗因中原无事而生奢靡之心，于是他开始热衷“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每千秋节，舞于勤政楼

下,后赐宴设醑,亦会勤政楼”(《新唐书·礼乐志十二》)为乐。因为良马出自青海,所以就进一步用兵西北,通过征服边疆民族以实现对优质资源的完全占有。但是穷兵黩武导致动摇国本,不仅引发内部发生重大变故,也使吐蕃等族得以利用唐内乱之机挥兵东指,唐方丧权失地,元气大伤,后世君主再想效仿玄宗那样骄奢淫逸却无强大国力支撑,因而只能感叹“运去”和“力穷”。“运去”二句,可能还暗喻国力衰微之后,如今的唐王朝已经难以再对西北、西南边疆保有强大的战略优势与控制力,只能听任疆土沦丧,所以才既“不逢青海马”,又“难拔蜀山蛇”。从这番强烈的今昔对比中,所得出的历史教训就是:由俭入奢是失败之由,拓土穷兵是国之祸胎。这种针对时事以历史的眼光直指最高权力核心予以痛切批判与讽刺,在李商隐之前,只有杜甫的反思可以与之相呼应,杜甫诗句如“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五首》其二);“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提封》)等,或反讽,或质问,声讨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杜甫又总带有一种宽慰:“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诸将五首》其一);带着一种期待:“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才”(同前,其五)。这是因为杜甫所处的时代,虽然形势险恶,但仍有赎救的可能。而李商隐之世,特别是唐武宗、李德裕执政之前,仿佛一切手段都已用尽,整个晚唐政治已陷绝境,几乎再无任何希望可言,更遑论边疆危机之化解,故地遗民之救援。中唐王建诗云:“胡马悠悠未尽归,玉关犹隔吐蕃旗。”(《朝天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其八)此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田侍中指田弘正,至开成五年(840)武宗即位,其间已相隔二十年的光阴,但边疆局势仍未迎来根本性改观。因此相比杜甫而言,李商隐的批判追讨更充满着冷峻绝望之情绪。

开成年间,李商隐又有一首《次陕州先寄源从事》,以寻常内容之书写而暗含讥讽唐代宗不以河湟土地沦陷为念之深意。该诗云:

离思羁愁日欲晡,东周西雍此分途。回
銮佛寺高多少,望尽黄河一曲无。

诗作于义山就任弘农尉期间,最表层之意旨,是抒发朋友间的分别怅惘以及自己对京城的思念,但后二句,又有超越表层意旨的深层内涵存在之可能。“回銮佛寺”,清人冯浩引《旧唐书·代宗纪》所记广德元年十月至十二月唐代宗出奔陕州避吐蕃陷京事,徐德弘注云:“佛寺必(代宗)还京后建以报功者。”^[20]“曲”者,朱鹤龄引《物理论》云:“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一直一曲,九曲以达于海。”^[21]刘学锴先生分析后二句云:“三四谓登上高高的回銮佛寺(唐代宗因吐蕃犯京畿而驾幸陕州,还京后在陕州建佛寺以报佛佑之功)而西望虢州,却望不尽黄河一曲,更何况是河(源)呢(以河源之源关合源从事)。”^[22]刘先生的引申至为有见。义山早年,对家国大事关心甚切,无论是对历史上的唐玄宗,还是当朝的唐敬宗,只要君德有差,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斥责讥讽。此时义山因一次行旅而登临代宗所建之佛寺,则有关代宗幸陕之旧事必然涌上心头。按,安史之乱以后,恰是因为唐代宗宠任程元振等宦官,方才导致广德元年(763)吐蕃陷京的恶性事件发生,也才导致唐西北数十州就此沦丧。代宗奔陕两月,是郭子仪等一帮股肱之臣的苦心操持,是长安等地义军的自发靖难,^[23]方使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代宗乘舆也得以重返长安。但劫难之后,代宗不仅不采纳柳伉等直士诛杀宦官以凝聚人心的建议,^[24]反而以建造佛寺的荒唐之举来庆幸自己的苟全。“望尽黄河一曲无”,在唐朝历史上,天宝年间哥舒翰收复被吐蕃占据的河西九曲之地,^[25]虽有黩武之嫌,但巨大的军事胜利,仍然激荡起社会上特别是士人群体巨大的民族自信与自豪感,赤诚的诗人们,依然写下“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高适《九曲词》其三)的诗句来欢庆疆土的拓展与和平的底定。后来河湟故地遗民历经百年艰苦而回归,诗人们又说:“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薛逢《凉州词》),以深情的笔触纪念胜利之

来临,也哀悼无数为国牺牲的烈士,可见黄河九曲在中原社会心理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李商隐看来,唐代宗身为一国之君,在国家民族突遭横祸,其自身又侥幸苟全之余,不知自省,不知恤民,不愿赏功臣,不舍诛奸佞,不知痛定思痛,不知改弦更张,徒知以建寺立塔而满足一己之私心自慰。以如此政治伦理、价值导向作引领,又如何能凝聚军民意志,又如何能望尽黄河之“源”?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代宗之时,唐对吐蕃的进攻组织过有效抵抗,但吐蕃军队仍然长期盘踞关辅以西,直至德宗朝迫使唐与之签订清水会盟,将河湟千里土地的归属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原因何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唐王朝最高政治伦理已经如此失尽,几代君主变本加厉摧残优良政治伦理,致使其尽有一朝坍塌之虞。在这种总体背景下,再怎么灵敏高效的体制机制设计与战略战术组织,都已无济于事,又如何再奢望胜利的降临,辉煌的重塑?所谓的佛寺,只能招致生前身后的耻笑与责骂。

三、昂扬精神状态的再现与复杂政治品格的折射

李商隐与杜牧长期牵心边事,并不仅仅体现在对形势的观察和对策的思考上。在诗文中,他们还将士人群体敢于担当、敢于牺牲的优秀精神品质予以特别的标识。尽管广义上讲,那些批评议论本身,也是优秀精神品质的重要体现,但是在具体分析中,将这种对士子精神品质的专门表述离析出来,将有助于更好看清晚唐文人希望建设的刚健精神状态。

开成三年暮春,李商隐进入泾原边幕,当时的唐朝政治因甘露事变而落入低谷,边事上也无甚进展。但李商隐却竭力以劲健笔触描画边镇上下积极昂扬的战斗意志。他笔下的幕主王茂元,面对的虽是“葱岭犹臃,雪山未复”的严峻形势,但没有露出任何怯懦退缩之意,相反却“拔剑而愤,弯弧不平”(《为尚书濮阳公泾原让加兵部尚书表》),发出“兔穴虽多,尽思堙塞;巢巢任固,皆誓焚除”(《为濮阳公上杨相公状》)的豪

言,一派勇猛武将的声概气势。广大泾原军士,尽管远途防秋,罹苦受寒,但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也是“贾余勇而例思尽敌,感鸿私而咸愿杀身”(《为濮阳公泾原谢冬衣表》),表现出下层兵员的深明大义。李商隐本有报国安邦的用世之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末尾,他即有“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的愤激之语表明心迹,现在又受如此形势与环境之濡染触动,就更培铸了一份激越意气。这种意气,是支撑诗人毕生关注边事的动力源泉。直到大中年间,诗人自己虽已在长期人生动荡中身心俱疲,但他依然在《骄儿诗》中勉励其子:“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穴”,示意要将收复失地的事业交由后代去完成。这种不屈不挠、不言放弃的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正是保证后来河湟回归,保证我们民族历经无数磨难而依然屹立不倒最为珍贵的意志品质。

李商隐在晚唐边事艰难之际所表达出的“志士高风”,杜牧也作了更为直接的宣示。前引《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辄书长句》诗所刻画的视死如归的边将形象,已经包含着杜牧对于英雄的钦慕,在《上宣州高大夫》中,他还对初唐在应对吐蕃东进事业中建立功勋的进士娄师德、进士郭元振极尽赞美,充满崇拜。至于他自己,则不仅在具体的议政论兵之中,特别强调身为士子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如《战论》结尾即云:“古之政有不善,士传言,庶人谤。发是论者,亦且将书于谤木,传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面对前方的战事,更是不止一次直接表露出愿意投身疆场的强烈意愿,如《郡斋独酌》诗末尾: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

再如《皇风》诗尾联:

何当提笔侍巡狩,前驱白旆吊河湟。

都表达了诗人希望为国尽力、替君分担的决心。其声气,十分类似自我荐举的奏章。^[26]如此磅礴遒劲的文士声气,在唐朝文坛上,确实睽违已久,

李唐立国之后,随着边疆战事的次第发生,文人们逐渐乐于到前线实现理想抱负,从初唐的骆宾王到盛唐的高适、岑参、王维,都向往并亲身实践“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的人生志愿。尽管从安史之乱起,唐在边疆上即遭遇极大困难,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唐社会内部仍未放弃信心,仍有克敌制胜的无限雄心在。面对肃代之际的吐蕃兵锋,杜甫发出“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登楼》)的指斥,其《寄董卿嘉荣十韵》诗,首二联言四川地势之险,中间六联详叙吐蕃致乱之害,但“猛将”以下诸句,全以报仇雪耻之语激励董氏奋击敌汽。末二联虽未脱功成名就的寄勉老路,但置诸当时唐内忧外患的极险处境中品味,却可见盛唐时代的昂扬精神状态虽然受挫但仍未沦丧。遗憾的是,这种对于昂扬精神状态的宣扬,到杜甫几成绝响。杜甫之后,尽管诗人们从未放弃对唐内政外交的关心关注,像元稹、白居易的批评之辞也不可谓不激烈,但文人们却越来越失却前辈们的铁血风流。广德元年吐蕃陷京,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形势之仓皇、牺牲之惨重,千载而下仍不忍视,然而在当时,除了僻处西南的老诗人杜甫自始至终痛心疾首,那些近在咫尺的青年诗人们,很少做真正有力度有温度的反映纪录,显示出一份令人窒息的懦弱。^[27]到了中唐,面对一个藩镇首领的离职,前引王建诗中即云:“老臣一表求高卧,边事从今欲问谁?”尽显仓皇之态。而凝望遗民,吕温也只能发出“暂驻单车空下泪,有心无力复何言”(《经河源军汉村作》)的无奈感叹。一斑窥豹,当时社会的总体士气的衰落低沉可想而知。因此,李商隐与杜牧能够在末世之际,发出那般坚定决然的声音,直接承继初盛唐高风响韵,确实代表着晚唐士人群体精神状态的再度奋发,或许可以看作这场民族劫难带给中原知识分子时近百年的砥砺折磨之后,在临近结局时所盛开的绚丽精神之花。

李商隐与杜牧皆为晚唐文学巨子,又都与当时以牛李党争为代表的高层政治牵连至深。有

关二人政治立场差异的辨析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小李杜人品与文品的评价,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但见仁见智甚至矛盾纷纭,似乎又是难以回避的困局。其实,如果细察杜牧讨论边事的名作《河湟》,或许能为更加公正认识两位诗人的为人作文,提供一个较为恰当的视角。

有唐三百年间中原王朝的边疆民族问题,以安史之乱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唐对四边取全面扩张之势,后期则表现为唐边疆防线遭遇压缩,其最典型的代表即是相当于今甘肃、青海全境以及陕西、四川西部大片土地的河湟地区被高原吐蕃占据时近百年。杜牧的《河湟》即是一首评论中晚唐河湟问题的政治诗,诗云: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诗以惜惋河湟久陷迟归为旨,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此诗开篇将唐宪宗、元载与天下“闲人”作正反对比。唐宪宗是有名的“中兴之主”,在位期间(806—820)不仅强力削平内部藩镇,且也积极准备收复中唐以后被吐蕃占领的河湟土地。其志愿直到大中朝三州七关回归之后仍被宣宗特别提出。元载虽为史上公认的奸相,但其人在代宗朝掌权之时,也曾提出过一系列收复河湟失地的计划。二人的共同点,就是对王朝边事取积极求变而非消极因循之态度。杜牧将二者并提,说明他是赞成对边疆取积极进取的政策。这也可以从诗人在会昌、大中诸朝的相关言论得到印证。如《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会昌四年作)中,他对李德裕“边障尚惊,殊虏未殄,防其入寇,犹须征兵”的决策表示支持,并强调对党项“取之及时,可以一战”。又如《贺平党项表》(大中五年后作)中,杜牧声明“是以不暂讨者不永宁,不一劳者不永逸”的见解,且引《诗经》中“宣王薄伐,《小雅》中兴”之语来论证“武功不成,文德不洽”之说。所有这些都表明杜牧确曾长期赞成以军事措施彻底解除边患的做法。

历史往往充满着荒诞,尽管杜牧如此高调宣示对边疆进取策略的支持,但检索杜牧的诗文,会发现在有些时候,他似乎对当局在边疆上的努力不以为然。譬如在大中五年所作之《李诚元除朔州刺史制》中,杜牧云:“自长庆以后,怠于制置,西北守帅,多非其人,侵略种落,厚自封殖。”在《朱叔明授左武卫大将军制》中,杜牧进一步“反思”长庆以后(即穆敬文武四朝)的边事“积弊”,云:“自长庆已还,益轻边事,选拔将帅,多非贤良,豪夺种落蹄角之畜,割削士卒衣食之赐。见利则往,见弱则欺,罔酬恩荣,不顾廉耻。积帛藏镞,丘累陵聚。是以战士离落,兵甲钝敝,积三十年,掷之不问。”从禁绝边将凌掠边民、盘剥兵士的初衷看,杜牧的看法不无其合理性,但是若将广大边防将士正义性的为收复失地、解救遗民所做的努力,都一概视为“罔酬恩荣,不顾廉耻”,就明显有失公允,其政治心理根源,则明显来自于宣宗上台以后务反会昌旧政、特别是竭力整肃李德裕等人的

恐怖政治环境。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杜牧借牛僧孺之口对文宗朝维州事件的事后置评。

维州是唐西南战略要地,中唐后为吐蕃占领,唐文宗大和六年,李德裕节度西川,一度有收复维州之计划与实践,但因朝中牛僧孺等人的阻拦,最终未能如愿。杜牧在《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僧孺)墓志铭》中,不仅借墓主之口批评李德裕的计谋“弃诚信,有利无害,匹夫不忍为”,而且还公开将李德裕定性为挟私报复与专擅权柄之徒,声言“天下恨怨”其人。李德裕究为何种人物,何种品质,历史自有公论,但维州事件的性质是边事,既然元载是杜牧所力赞者,而李德裕又是杜牧所深斥者,那么以常理论,元载与李德裕的边疆政略必然大相径庭,然而检讨二者的有关文牍,会发现他们的谋划有着惊人的一致。按,《资治通鉴》卷224、卷244、卷247分别有关于二人边疆政略的详尽记录,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问题,这里拟制表如下:

	前期准备	边情分析	战略目标	实施步骤
元载	(大历八年)初,元载尝为西州刺史,知河西、陇右山川形势。……并图地形献之,密遣人出陇山度功用。	(元)载言于上曰:“四镇、北庭既治泾州,无险要可守。陇山高峻,南连秦岭,北抵大河。今国家西境尽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其西皆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给军食,故垒尚存,吐蕃弃而不居。”	(元载言曰):“渐开陇右,进达安西,据吐蕃腹心,则朝廷可高枕矣。”	(元载言曰):“每岁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远,若乘间筑之,二旬可毕。移京西军戍原州,移郭子仪军戍泾州,为之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
李德裕	(唐文宗大和四年冬,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德裕置镇,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会昌四年三月)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使之先备器械粮糗及诃吐蕃守兵众寡。	(李德裕言曰):“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中,是汉地入兵之路。……”	(李德裕言曰):“欲遣生羌三千,烧十三桥,捣吐蕃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没身恨不能致者也。”	(李德裕言曰):“臣初到西蜀,外扬国威,中缉边备。其维州熟臣信令,空壁来归。臣始受其降,南蛮震慑,山西八国,咸愿内属。”

两相对照,几无不同。既然如此,杜牧将元载拔高到类似于苏武一般赍志而死的民族英雄,而指李德裕为逐利忘义的恶人,也就不无可议之处了。

以牛李党争为代表的晚唐政坛角力,是唐代政治史上一段并不易判断清明的公案。牛李党争本身,既有政见分歧,亦含宗派倾轧,多种因素

复杂纠缠,其是其非,千载而下尚难明究竟,想要那些夹处其中的文人们也能作出恰当的人事选择与准确的政治判断,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政治绝不等于厚黑学,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矛盾或迟疑,绝不意味着连基本的价值判断、是非观念都能无原则地被罔顾。收复河湟是关系到社

会安宁、政权稳定与民族荣誉感、凝聚力的大事，无论是谁，无论持何种政治观点，无论属何种政治派别，在涉及这个根本问题上，都应头脑清楚，不管是谁执政，只要做出有利于收复失地、解救遗民的工作，就理应被肯定。李德裕掌权期间，在边事上经略操持，逐回鹘、战党项、谋复河湟，其精神其才干，必须得到公正评价。更何况李德裕为收复河湟所做的各项努力已经在唐宣宗即位后收到成效（后来，秦、原等三州七关回归，本质上是李德裕奠定的基础，宣宗君臣妄图揽功于己，这是徒劳的）。杜牧作为李德裕同时的文人，又自诩深谙国家治理之道，李德裕的分量与功绩，他应该能衡量清楚，但他却表现出明显的前后不一、左右矛盾。当李德裕得势时，杜牧竭力献计画策，李德裕失位，又因人而废言废功，落井下石，甚至不惜采用厚诬之法。不管其自持有何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都只能反过来证明其个人品质的有差。

与杜牧的首施两端相比，李商隐的立场则要公正、纯粹、连贯得多。对于其所处时代的边疆形势，他始终怀着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河湟未归，他执着牵念。三州七关收复，朝野上下一片颂歌盈耳，他则不断在诗歌中提示注意边疆依旧未安的现实，显示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对于历史上一切为边事、为国家民族付出过辛劳的人们，李商隐也能本着悲天悯人的心态如实表彰他们的精神品德，从普通的远途防戍守边关的兵士，到王茂元这样“猿臂渐衰……白首未归”（《为濮阳公与丁学士状》）的前线将领，抑或是辛苦奔走入蕃使节，都被诗人置诸笔端，投注极为沉郁的感情。当胜利来临之际，李德裕这样的名相早已斥贬南荒，一切“识时务者”避之唯恐不及，毁之复忧滞后，唯有李商隐敢于替之鸣冤。早在大中二年，在当朝衮衮诸公咸欲对李德裕落井下石之时，他便创作出《旧将军》一诗，呼吁不要忘记旧将军的荡寇之勋，更能体现李商隐为李德裕鸣冤叫屈的，则是作于三州七关回归之后的《漫成五章》其五，诗云：

郭令素心非黠武，韩公本意在和戎。两
都耆旧偏垂泪，临老中原见朔风。

这首抒情诗的背后，有着宏大的叙事背景。当此唐蕃角力基本上可算画上句号的时候，诗人在回顾中点评唐开国以来曾有效处理西北军务的名将，包括战与和两个方面，认为郭子仪和张仁愿（封韩国公）虽然屡立战功，但其本心却在和戎，而非黠武。虽字面上只提郭、张，而晚唐时期扭转边境被动局面，与河陇回归有更为直接关联的名相李德裕，自亦在不言之中。因其在宣宗上台后即遭远贬，而此前牛僧孺沮抑其收复维州所列举出的诸如见利忘义等各项理由，此时又被在台的白敏中、令狐绹以及像杜牧这样的文人重新提及，作为搞臭李德裕的重要证据。李商隐敢于在如此恐怖的政治环境中高倡公道，确实彰显出巨大的政治勇气与非凡的道德操守。

李商隐为李德裕辩诬，根本上是基于诗人对民族的赤诚感情和对历史的公正态度，正是因为他正确认识到了李德裕的功绩，所以他才能够义无反顾地赞美这位名相。同样，大中朝以后牛党执政，就个人际遇而言，李商隐可能更加淹蹇沉滞而无升迁之希望，但是对牛党要人杜惊、李回、白敏中等人在西川等地所组织的一系列针对边疆民族的政治军事安抚善后事宜，李商隐同样能够不为党派陈见所囿，而予以真诚的讴歌。本质上也是出于一种质朴纯粹的爱国心理。有这样的爱国心理作支撑，李商隐其所达到的道德高度，所展现的人格魅力，无疑更加崇伟夺目。

注释：

[1] 据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所附之《杜牧诗文集系年目录》，杜牧最早的作品是作于敬宗宝历元年之《上昭义刘司徒书》《阿房宫赋》二文；又据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增订重排本）《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李商隐最后一篇可供编年的诗歌为《锦瑟》，作于858年，最后一篇文章为《上任郎中书》，作于大中十年后。又，本文所引李商隐与杜牧之诗文，均据上述三书，不再重新出注。

[2] [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0页。

[3]按,杜牧所述崔郾谏诤之事,史籍中亦有记载,参见《册府元龟》卷546“谏诤部·直谏十三”所载李珣、郑覃、崔郾、辛丘度、韦瓘、温会等谏诤唐穆宗事。

[4]《资治通鉴》卷242“穆宗长庆二年”记云:“崔植、杜元颖为相,皆庸才,无远略。史实诚既逼杀田布,朝廷不能讨,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节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讫于唐亡,不能复取。”是为对晚唐藩镇割据局面的准确概括。

[5]参见《册府元龟》卷979“外臣部·和亲二”、《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盟誓”等条。

[6]《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818页。

[7]在唐与吐蕃两百余年的交往史上,尽管基本上能做到尊重来使,但是受彼此关系的总体动荡曲折影响,有时也难免发生拘系对方使节的事件。会昌年间,李商隐居乡守制,曾与有过出使经历的怀州刺史李璟走动,对李璟“万里以遥,三时而复”的辛苦深表矜念,《为怀州李中丞谢上表》《为李郎中寄襄端州文》即与李璟有关。他还受人之托,为因出使而获罪遭贬的濠州刺史李从简写过祭文(《为李兵曹祭濠州刺史文》),可见他对唐朝入蕃使节的行止际遇是了解的。因此他在诗文中屡有对这类特殊群体的关注,除正文所引之外,李商隐又有“虞雪岭之惊烽,忽玉关之滞使”(《祭外舅司徒公文》)之句。直到大中朝三州七关来归,他还写下“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杜工部蜀中离席》),将远使异域的入蕃使节与久戍边陲的前线军士并举。这从一个侧面也证明入蕃使节遭到囚禁,可能在当时确非孤例。

[8]唐史中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譬如唐代宗广德二年至永泰元年间,吐蕃即多次与回纥、党项等族组成联军,进攻唐畿辅地区,后因唐叛将仆固怀恩死,加上郭子仪巧施离间计,方才瓦解了联军的威胁,参见《资治通鉴》卷223,第7166-7167、7176-7182页。

[9]《资治通鉴》卷244“大和五年九月”条载维州事,言李德裕在接到吐蕃守将悉怛谋归降之请后,一边派员接应,一边“具奏其状”,唐文宗遂命群臣讨论:“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这段记载至少说明,唐文宗当时对李德裕收复维州的计划,是较为动心的。

[10]参见《资治通鉴》卷245,第7905、7908页。

[11]令狐楚是中晚唐之际的重要臣僚,他对边事的熟悉与关注,从一事即可窥探。令狐楚曾经编《御览诗》,选诗286首,其中涉及民族问题的即有61首。令狐楚又有《年少行四首》,其三云:“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直言不忍河湟久悬不归之痛,李商隐少依楚学,自当很早即从楚之口中获悉唐王朝边事的详情。开成五年十月,李商隐作《献华州周大夫十三丈启》,中云:“今者北诛杂虏,西却诸戎。蓬岳分忧,虽期于河润;云台伫议,终于天慈。伏料即时,必降征召。”意思是当此边疆多事之际,周俾作为地方长官,也为君主忧心边患,而君主必然会及早征召周俾,使其有裨边政。这说明至少在李商隐看来,这位前辈官员对边疆民族问题是熟悉的。又,文宗大和八年后,李商隐一度从事充州崔戎幕,据《旧唐书·崔戎传》,崔戎曾于大和三年南诏入蜀后,奉命

赴西川宣慰,史称“废置得所,公私便之。”李商隐跟随崔戎时间虽短,但崔戎这段绥抚边陲的经历,也必然为诗人所习知。

[12]李德裕抗御回鹘,在会昌年间已有大胜,但对河湟的收复,当时只是做了一些重要的前期准备和谋划工作。参见李德裕《请于太原添并被状》《赐缘边诸镇密诏意》等文,以及《资治通鉴》卷247“(会昌四年三月)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条。

[13]指曾于唐穆宗长庆元年下嫁回鹘的太和公主在武宗会昌三年二月被唐将迎回长安一事。按,太和公主回朝,当时社会十分关注,不少诗人曾针对此事进行吟咏,参见王树森、余恕诚:《论唐代和亲诗歌的诗史意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4]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30,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09页。文中公布了多项发展河湟的举措,如开荒营田、免税定籍、移民实边、改善交通、便利商旅等。

[15]参见周建国:《郑亚事迹考述》,《文史》第31辑。

[16]题名依《全唐诗》录文。

[17]参见王树森、余恕诚:《唐蕃关系视野下的杜甫诗歌》,《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

[18]参见《册府元龟》卷993“外臣部·备御六”。

[19]参见余恕诚、王树森:《唐代河湟诗歌的诗史意义》,《学术界》2012年第8期。

[20][21]转引自《李商隐诗歌集解》第370页注③,又检《唐会要》卷48,大历年间唐代宗在长安即曾建章敬寺、宝应寺等。近年来,河南陕县又出土过《汾阳王置寺庙碑表》,述及大历九年于陕州所见空相寺。如此看来,则徐氏所谓回塞佛寺为唐代宗“还京后建以报功者”的推断,确有其根据。

[22]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23]参见《资治通鉴》卷223,第7152-7154页。

[24]参见《资治通鉴》卷224,第7155页。

[25]中宗朝金城公主出嫁吐蕃以后,吐蕃高层曾请九曲为公主汤沐之地,参见《资治通鉴》卷211,第6704页。

[26]在作于大中三年的《上河阳李尚书书》中,杜牧在回顾“自艰难以来,儒生成名立功者,盖寡于前代”的历史后,建议李尚书能够顺应形势,在内外事务上主动作为,作出榜样,“使天下后学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如今古成败者不能为之。”可见他对文士应在国家要务上发挥应有作用,持有一以贯之的看法。

[27]广德元年吐蕃陷京,当时的年轻诗人有正面纪录的,只有钱起《广德初塞驾出关后登高愁望二首》《塞鸾碧狄岁寄韩云卿》、独孤及《癸卯岁(笔者按,即广德元年)赴南丰道中闻京师失守寄权士繇韩幼深》等数首,诗中所表现出的感情基调也多是悲苦仓皇的,如“渴日候河清,沉忧催暮齿”“胡尘晦落日,西望泣路歧”等。

[责任编辑:李本红]